



中国

经济政策
思想史

主编 马伯煌

中国 经济 政策 思想 史

主编 马伯煌

著者 马伯煌

郑 韶 (副主编)

张忠民 钟祥财

张赛美 程念祺

陆兴龙

云南
人民
出版
社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吴 垠

封面设计: 罗利坚

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规划重点课题

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

马伯煌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1 字数: 650000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其中精装 1000)

平装 ISBN 7-222-01221-4/F·162 定价: 18.50 元

精装 ISBN 7-222-01222-2/F·163 定价: 24.00 元

主 编 简 介

马伯煌，原名马彭原，辽宁海城籍。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院毕业，硕士。曾任沈阳国立东北大学教授，代政治系主任，兼理法商学院院长事。建国后，历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任教，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他从事研究著作和指导编撰的主要成果，关于近代部分的有：《关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问题》，《刘鸿生企业史料》（全三册，主编），《论旧中国刘鸿生企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全三册，主编），《研究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几个根本原则》等。关于上海地区的有：《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全一册，主编），《上海地缘经济论衡》，《上海浦东地区开发的历史、现状与展望》，《外向型经济的今昔观》，《企业决策与经营管理问题》，《上海经济开发的历史思想与实际》等。关于古代部分的有：《二十四史·宋史》（参加校点和定稿），《宋初军事行动的经济目的与策略》，《研究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主要问题》，《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掘、整理和运用》，《关于建立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应用体系问题》，《开放型的民族性格与历史上的闭关政策》，《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儒学历史论略》，《历史的峰谷和走向》（全一册，专著），暨现已出版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全一册，主编）等。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Editor in Chief

MA BO-HUANG, orig. name MA PENG-YUAN, nat. Hai-Cheng County, Liao-Ning Province. Educations: BA, 1938, National Univ. Peking; MA, 1946, School of Higher Studies, Faculty Philosophy, Johns Hopkins Univ. U. S. A. Appointments: Professor, Once as Acting Chairman of Political Science Dept. and Charging Affairs of Dean, Law and Commerce Sch, Northeastern Univ, Moukden, 1946-48; Prof, Law Sch, Soochow Univ, 1950-52; Prof, Shangha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953-58; Research Prof, Econ and Hist, Pres, Sr Experts Fraternity, Shanghai Acad Social Sciences, 1958-. Main Publications concerning bistorial questions of modern times, include: Pro-blems of Chinese Capital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ocumentary History of Ong-Seng Liu's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3 volumes); Princip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Ong-Seng Liu's Enterprises;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3 volumes);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in Studing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etc. That concerning questions of Shanghai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constructions, include: Historical Though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dern Shanghai (1 volume); Geoeconomics of Shanghai;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Pu-Dong Area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its Future Prospect; The Present and Past Conceptions of Export-Oriented Economy; The Tactic Decision and Operation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Economic Ideas and Reality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etc. That concerning the ancient times, include: Marking and Checking of the Song History of Twenty-Four Histories (Participant and One of Final Readers);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Objectives upon the Military Strategic Operations in the Beginning of Song Dynasty; Main Problems in Studing of the Chinese Ancient Economic Ideas; The Exploration, Sorting Out and Applic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Ideas on Managemen;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Open Type and the Close-Door Policy in Histor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eudalism; A Brief Analysis of Confucianism; The Rise and Fall with General Tendency of Chinese History (1 volume); and now, The Traditional Ideas of Economic Policy in Chinese History (1 volume); etc.

0000/12

内 容 介 绍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所行的经济政策思想，探索其发展的源流和演变的历史论证著作。它以“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一理论为指导原则，根据可靠资料，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系统地分析二千多年来各封建皇朝对于农田水利、赋役征榷、仓储漕运、平准均输、工艺坑冶、商业钱币、交通开辟、人口迁移等各方面所原的经济思想和所行的政策措施，及其历史的继承和演变，体制的改革与废置，加减损益的得失，成败利钝的影响，提出自己的明确观点：诸如历代皇朝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的两相结合、互为利用，形成了两者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暨其相对平衡与相互制约的机能作用。因此，尽管政权统治的兴衰隆替，社会经济的改弦更张，但实质则是“改体而不变性”，“转向而不脱轨”，综括成为“变法而不变政”的历史经验。书中的研究论证，可供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参考和借鉴，使古为今用。

序 言

关于研究《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 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在每一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则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当然，在阶级社会中也存在有平民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尚，但这种思想文化和社会风尚是不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正如儒学中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① 尽管那些君子们所持的议论和主张，也有蔽于一曲或阉于大理之处，但是统治阶级的习惯势力和门户偏见，终会给它们保留一定的价值和市场。儒家“承认社会阶级的存在”^② 之说，从上述君子与小人社会地位的不同，可以得到佐证。关于《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既是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经济政策思想的论析，也是对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

① 《论语·颜渊》、《孟子·滕文公上》。

②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50页。

的反映。并且中国一向是多民族结合的总体，对于历史问题的论证，更不能忽视统一国家树国立政的根本原则。因此，本书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爱国主义民族观，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以反映历史本来面貌出发，屏除因人论事与就事论事的“皮里阳秋”之论；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扬弃那些浮泛的类比推理与牵合附会之说。力求能够鲜明地显示出它的科学系统性来。

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苏州讲学时，论及史部，颇推重汉之司马迁和宋之司马光。盖史公职在纪实，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善恶必书。故《史记》虽遭后世“谤书”^①之毁，但从中可以覘出当时政治经济故实和社会生活面貌。而温公则责在探索前代国家盛衰与生民休戚的历史渊源，通古今之变而究其隆替之理，故《通鉴》有“资治”之称^②。治史者能于历史实际中窥其窍要，可谓得其旨趣矣。

①见《后汉书·蔡邕传》司徒王允答太尉马日碑请以蔡邕续成后史语。李贤注称：“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算缗、榷酤之类是也。《班固集》云：‘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史记》受“谤书”之毁，渊源如此。

②案《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略称《长编》）卷二〇八宋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辛丑编，司马光《资治通鉴》初名《通志》。四年十月九日，司马光进读时，神宗亲制序面赐光，赐名《资治通鉴》，令候书成日写入。参《长编拾补》卷二治平四年十月甲寅编暨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关于《通鉴》的完成与表进，则见《长编》神宗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编。

历史上存在有偏见，事属平常。古人云：“人皆贵远贱近……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生为盗跖，死为夷齐。”所谓“生愚死智，惑已甚矣。”而建国称王者“推过于人，引善自向”。及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①至于晚近特殊时机所出现的别有意图者，于头脑发热中竟把历史当作商品一样，公然提出历史可以伪造之说，更不足数矣。所以历史主义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历史，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史学在社会科学中属于领域最为宽广、问题最为庞杂的学科。在浩如渊海的史册记载、石室珍藏、考古发现及不同民族文字的史料中，如何进行董理贯通、解释分析，非运用新进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只能是在历史相沿的成说中耍花架子、翻跟头而已。因此，重温《庄子》“庖丁解牛”之义，感有必要。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初见牛时，则庞然大物，不识理间之所在；三年之后，牛身理间毕见，而目无全牛。解牛时，庖丁全身手足各适节奏，操刀斫割，因便施巧，闲习尽理，似合乐舞。文惠君赞其技巧之善，庖丁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②庖丁能把他的思想理致寓于解牛的技巧实践

①晋时隐士赵逸语。《洛阳伽蓝记》卷二“崇义里”条。

②《庄子·养生主》。下同。

之中，熟练至极，达到了妙契牛身理间，能“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地步。因此，庖丁之刀用了十九年，分解了数千只牛，而其锋锐却仍如新发于磨石者然。庖丁解牛所掌握的关键，一是“批大郤”，即劈开牛身骨缝（亦称“骨罅缝”）之所在；一是“导大窾”，即分离牛身关节（亦称“节骨眼”）之所在。骨缝与关节各有其间隙，而刀刃锋利无厚；以无厚之刃入于有间的骨缝与关节之中，必然游刃而有余地了。《庄子》这一设喻之理，对于我们如何致力于广廓而复杂的历史科学研究，实起发人深省的妙用。

何谓历史学的“大郤”与“大窾”，其特征又是什么？“批大郤”使之分离，“导大窾”令其支解，所郤求者又将如何？这是各人对史学的理性认识与学科修养问题，言人人殊。就经济史学来说，其“大郤”必须是贯穿古今，在发展变化中反映为中国的特色；其“大窾”应当是连系综体，在机制作用上涉及到国力的强弱与民族的兴衰；此其一。对“大郤”的批离与对“大窾”的支解，足以显示这一历史综体结构的理致所在及其平衡与制约的形态关系；此其二。根据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在具体分析中对历史事物重新作出实质性的认识与评价；此其三。

笔者从上述三点出发，遂以贯穿中国封建经济历史上的官商问题作为先批的“大郤”，操刀必割，殚然而解。在对官商的分解上，游离出三个问题：（一）对历史约定俗成的重农轻商或重本抑末之说的重新认识。——认为所谓轻商抑末，乃封建朝廷限

制商人资本活动的政治手段，这实质是古代官商对私商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对立矛盾和因势利导问题。（二）对历代变法改制的实质再作评价。——认为唐宋而后，不论是变法或更复，都没有背离家法、祖制及传统的政策原则，实际是变法而不变政。（三）封建政府的户部与宫廷的内帑之间关于国家财政的内外对掌和机制重叠问题。——认为这是历代封建皇朝所惯用的使政府机构职能达成平衡与制约的一种体制。在中央高度集权的政府体制中，非内外对掌、互相牵掣，则皇权不足以收张弛互用、操纵自如之效。所谓秦、汉之少府，唐之琼林、大盈，北宋的内藏、封桩，南宋高宗的内库、孝宗的南库，以及明、清两代的内帑等等，无非是内外权力对掌原则下的产物。其所由来，盖已远矣。

其次，在对历代田地制度的分解上，则显露出三个问题：（一）封君食邑与地主食租的问题，是贵族勋戚和地主富商经济政治上的对立与统一。其政策思想源于古语的“宗子维城”与“貽厥子孙”。——这两种思想，从远古到近代，对于经济与政治之间所形成的作用与反作用的矛盾关系，以及政策本身由于正反作用的鉴戒，从而导致出历代政策措施不断地张弛、存废、演变与更复，使这两种不同的政策思想，在历史上交织绵延有二、三千年之久而沿袭不替。（二）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与经济上的贫富易位问题。——这实际是政治权力的新调整和社会财产的再分配；而在不断的重新调整和再度分配中，

体现出中国封建制度的松散性和不大发达的民主性。(三) 封建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及其政策思想与社会存在的悖离。——这一问题，包括后期封建社会土地与赋役制度的混乱反常，征缴的倚轻倚重，逋欠、抛荒与流民的大量出现，以及朝廷在经济政策思想上的缺乏系统与通筹。国无常安，则无长策，明代财政危机的恶性循环，可作为历史的例证。

第三，对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的分解，也提出了三个相对的观点：(一) 从地缘经济来说，有一个从西北向东南的倾斜发展的倾向；而从地缘政治来说，却又倚仗东南支持西北，以迎对民族竞争的热点。——这是中国历史一直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也是经济政策思想上所注重的一个基本点。(二) 由于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逆向的历史发展，在大一统的局势下，随着各种权力的集中，与之俱来的必然是各种矛盾的集中。并且地缘经济的发展决定着中朝经济政策的确定，于是挹东南以注西北、挹地方以注中央、挹外朝以实内廷的节节集中，遂成为皇廷的家法祖制、一代的既定国策。随着权力与矛盾的并行集中，各种政策措施，如关于农田水利的倡导，盐铁茶酒的产销，赋役的复免，灾荒的赈济，聚兵省区的协饷，边远地带的开发，以及对物价的平准，征敛的均输，交通运输的开拓，钱钞流通的改变，诸凡有利于地方的经济政治相对稳定与均衡的调控和管理者，都归朝廷直接指

挥与颁行；而实际上却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有一套完整的官僚机制在推动。但是，历史的实际也存在着相反的一面，即地方割据自为与矛盾分解。——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问题。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与“五代十国”是中国的分裂时期，从外部来说，未闻某一地方割据者在经济上仰给于他国；从内部来讲，除了中原地带人竞逐鹿之外，其江南地方割据者率多鹜于土地的垦拓，水利的开发，手工工业的制造与地方特产的交流。经济发展，人习所安，老百姓几百年间不识兵戈。当然，分裂与割据，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浪花，并非主流。但在特定时代、特定形势、特定地方条件下所出现的历史特殊现象说明了什么，从中又可以吸取些什么？还是值得研究的。（三）关于历代对外开放与经济交流的政策问题。——从大陆丝绸之路的开辟，历史所昭示于后人者，主要是经济交流或文化传播。唐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历史发展重心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南海上交通的开辟，以及海上丝绸航道的兴起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失势，在封建皇朝来说，主要是“内夷于中国，覃及鬼方”^①的炫威耀武、用以宾服远人的传统政策思想在起作用。其坐大自尊的结果，所得到的是价值低于“赏赐”的域外贡品，从贸易经济来讲，则大都是利权外溢多于内流，竭中国之力以事夷狄。因此，在不同的形势条

① 《诗经·大雅·荡》。

件下，也采行过闭关政策。那末对历代的市泊（海关）制度进行研究，以了解在中、外经济交流方面的历史作用，也是有其意义的。

上述对三个历史综体问题所作的分解，游离出九个具有两面性的对立统一问题，亦即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中所存在的属于实质性的问题。它们在理论上反映为：控制与反控制，作用与反作用，相对与绝对，平衡与制约，集权与分治，固执与张弛，调控与管理，封闭与开放，以及反向发展与相对调剂等问题的发展与转化。这九个问题又是互相联系存在的；而从其定策的原则和决策的思想来说，其中涵溶着儒学的大义微言，老、庄的玄谈远论，名、法的理致权术，杂家的体用兼合。所以，历史上的经济政策思想，即是在封建政治导向之下，也并不是恒定的、一成不变的，乃是因应客观存在的要求和本身发展的需要而损益变革的。那末在分析论证中，则应视其作用和影响而权衡其历史意义和价值。

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应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存在的经济。对于经济思想史来说，也是这样。如果说前代历史是一面镜子，则与之相对的后代事物的活动形象，应当从前代历史上找出它们相似的影子；而前代人的思想作用，也应当由后来人为它们作出相应的评价。因此，我们主张对历史事物要作动态的研究，才能使其对人们有所启发、有所戒鉴。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史，如何掌握其特点，认识其所代表的民族文化价值及其在发展演变中所反映出的历史作用，应以研究经济政策思想史为首要。关于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先进之士在中外思想的冲激合流中，曾起其激浊扬清、含英咀华的作用；并发挥其勇于进取、善于创新的精神。这更说明了在渊源博衍、理致精深的固有经济思想中，涵溶着坚持真理、融通合变的民族优良传统。则本书的研究写作，对于我们现在的经济政策措施，或有可资借鉴之处，使古为今用，此固作者们所翫勉以求之者。

本书的研究写作，原意如此。一得之愚，幸希读者教之。

马伯煌

一九九二年七月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PREFACE

On the Ideological Mode and Demonstrative Methodology in Studying the Traditional Ideas of Economic Policy i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history of class society, the ruling ideas of each age have ever been the ideas of its ruling class; while those placed at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any national cultural institutions have been mainly the cultures of its ruling class too. It is natural, that in the class societies also existed the ideas, cultures and social customs of the common people, however, which could not occupy a ruling position. Just as the Confucianism states, lord's wind of virtues will prevail over the grass of virtues of common people with lower status. Though the lord's arguments or ideas are one-sided or not confined to principles, the habitual force and prejudices of ruling class will keep a definite value and have market for them. The Confucian teaching that acknowledges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classes, can be proved by the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between lords and common people as

above—mentioned. In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of ideas of Chinese economic policy, we should also discuss or analyze not only the economic policy of feudal ruling class in Chinese history, but also reflect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ving mode related with it. Moreover,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community of multi-national combination, when discussing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we can not neglect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of building our state and erecting our political system in an unified country. Therefore, being based up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atriotic national outlook, starting from practices reflecting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features by returning the problems with attitud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rough discarding critical methods of discussing problems merely relying upon certain things, we should seek out its outstanding scientific system with some new point of views.

While giving lectures in Suzhou, modern master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Zhang Tai-yan (章太炎) who was talking of history sang praises of Sima Qian* (145?—90?

* Sima Qian (145?—90? BC), son of Grand Historian Sima Tan, succeeded his father in the position of Grand Historian. He divided his material into five sections: Basic Annals, Chronological Tables, Treaties, Hereditary Houses, and Memoirs. This arrangement, with various modifications has been followed by almost all official historians.